

สาเหตุ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สู่การผ่อนคลาย ในยุค 1950

ศิริเพ็ชร ทฤษฎาวดี

ภาควิชาภาษาจีน คณะ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กรุงเทพมหานคร 10200

อีเมลล์: siripetch@gmail.com

บทคัดย่อ

จากผลกระทบของสงครามเย็น ทำให้ช่วงต้นยุค 1950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ตกอยู่ภายใต้อำนาจของการทูต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ม่เพียงไม่ให้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สถานะ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จีนใหม่เท่านั้น แต่ยังคัดค้านการเข้าร่วมเป็นสมาชิกสหประชาชาติของจีนอีกด้วย ทั้งยังห้ามการติดต่อค้าขายกับจีนโดยเด็ดขาด ส่งผลให้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อยู่ในสถานะที่ไม่เป็นมิตรต่อกัน อย่างไรก็ตาม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ค่อยๆผ่อนคลายลงในช่วงปี 1955 ถึง 1957 อันเนื่องมาจาก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โลกและนโยบาย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ของจีนที่เปลี่ยนไป รวมถึงแรงกดดันจากปัจจัย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ทั้ง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

คำสำคัญ: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คนเชื้อสายจีน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 สองสัญชาติ

The Sino-Thai Relations in mid-1950s: Alleviation from Tension

Siripetch Trisanawadee

Chinese Department, Faculty of Liberal Arts, Thammasat University, Bangkok, 10200,
Thailand

Email: noom2517@yahoo.com

Abstract

With Cold War thinking the Thai government carried out pro-America foreign policy in the early 1950s, not only rejecting recogni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t also opposing China joining the United Union and blockading trade with China, therefore the P.R.C. however, was isolated from Thailand, Howeve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ountries began to be ease from 1955 to 1957. Reasons for the change will be analyzed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then, Thai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and China'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Thailand.

Key-words: Thailand, ethnic Chinese, Sino-Thai relations, dual nationality

五十年代中期泰中关系从紧张走向缓和的原因

黄瑞真

泰国法政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曼谷，10200，泰国

电子邮箱：siripetch@gmail.com

摘要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泰国唯美国外交政策马首是瞻，不仅拒绝承认新中国政府，而且还反对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中泰关系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但是，冰山终有松动的时候，中泰关系在 1955 年至 1957 年出现短暂的缓和。究其原因，除了受国际形势和中国外交政策等外在因素影响外，更主要的动因还是来自泰国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压力。

关键词：泰国；华人；中泰关系；双重国籍

二战结束后,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美、苏主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分别成立。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在全球范围构筑反苏反共包围圈,竭力将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中间地带”国家纳入自己的阵营,建立反共同盟。泰国作为一个地理位置上靠近苏、中社会主义阵营的东南亚国家,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美国自然不会放过。因此,从 1945 年至 1954 年,美国对泰国的政策几经变化,最终和泰国建立了同盟关系,将其绑在了反共的战车上,使其成为美国在东南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重要战略基地。而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于 1949 年成立后采取了“一边倒”政策,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泰国采取完全敌视中国的态度,对外抵制新中国政府,对内镇压华人华侨,中泰关系处于基本隔绝状态。

1955 年至 1957 年,泰中紧张关系一度出现缓和迹象。1955 年 4 月,中泰外长在万隆会议期间首次举行会晤;1955 年底,泰国总理披汶派出秘密使节访问北京¹,两国代表随后又在缅甸秘密会晤并签署了一项旨在促进友好往来的联合声明;1956 年 5 月,泰国外长称:“关于承认中国问题,泰国已改变原来的立场,一旦中国进入联合国,泰国就会承认”;²同年 6 月,泰国政府解除对中国的非战略物资贸易禁令,并放宽了泰国人民与中国人民来往的限制,截至 1958 年 10 月沙立上台前,就有 24 个泰国代表团访问了中

¹阿利·披荣,《新时期泰中建交之内幕》,林明点译,香港嘉富林国际有限公司,1999 年,第 76-77 页。

²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载《东南亚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4 页。

国，而且几乎都受到周恩来总理及其他中国领导人的接见。¹此外，为了向中国领导人表示泰方改善泰中紧张关系的诚意，披汶还导演了一场“人质外交”，将其幕僚帕他努泰的两个孩子秘密送往北京，理由是：“由中国政府照顾（这两个孩子），我们可再次向周恩来表示我们要改善关系的真诚决心和我们对中国的绝对信任。没有哪一种信任要比这种骨肉之情更深厚。这是两国关系的一个开端，这种关系要一代一代传下去。”²

泰中关系能够在五十年代中期出现短暂的缓和，除了受国际大气候转变的影响以外，更主要的动因来自泰国国内。

一、国际形势暂趋缓和，泰国披汶政府外交政策“见风使舵”。

1953 年 7 月，朝鲜停战协定生效，冷战后的首场热战由此冷却。从表面上来看，中美两国在这场战争中似乎打了个平手；但是，从政治影响的角度来看，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敢于对抗实力悬殊的西方头号强国美国，这已经是新中国的一大胜利，大大提高了新中国在亚洲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政府逐渐放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式战略思维，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且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国际会议。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领导人不断地向外界释放中国愿意缓和中美关系并促进地区和平的诚意。1954 年 8 月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中国希望和平，也希望美国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955 年 5 月接见印尼总

¹朱振明，谢远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载《东南亚》1990 年第 1 期，第 9 页。

²常媛，《龙之珠》，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第 11 页。

理时，毛泽东又重申了中国希望与美国和平相处的愿望，“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1955 年 5 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就缓和远东局势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谈论缓和远东局势的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¹ 该声明在国际上赢得了广泛的好评。与此同时，西方阵营在是否承认新中国政府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英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纷纷要求美国接受中国共产党已成功执掌中国政权的事实，承认北京政府是中国合法政府，并接纳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迫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美国于 1955 年 8 月 1 日在日内瓦与中国举行大使级会谈。²

泰国统治阶级及时捕捉到了国际紧张形势有可能趋向缓和的信号。就在中美苏等国还在就朝鲜停战协议进行谈判的时候，泰国披汶总理就敏锐地意识到国际政治环境可能出现重大变化，认为泰国的外交政策需要适时予以调整。1953 年 6 月 10 日，披汶在内阁会议上提出，泰国应该对朝鲜半岛可能出现的停战情况做好应对准备，尤其是要考虑对华政策问题。披汶在会上同时提出了“如果美国人撤出亚洲，我们该怎么办”等问题。经过几次讨论后，内阁会议决定委托外交部长纳拉提负责密切跟踪形势的发展，并及时拟定相关的政策措施。³ 1955 年 10 月，披汶亲自询问美国驻泰公使，美国是否已经改变了反对共产主义中国的立场，对华政策又有哪些变化。美国公使答

¹宋晓东，《50 年代后期—70 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郑州大学硕士论文，2004 年，第 9 页。

²同注

³（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 0201.12 / 14 号

复说，美国政府仍然坚持反对共产党中国，继续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同时依然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加入联合国。但是，披汶并不完全相信美国人的说法，在会见美国公使后没几天，他就针对外交部关于中国加入联合国问题的报告做出批示说，“目前形势已发生变化，该是重新考虑我们政策的时候了”。¹ 1956 年 6 月，泰国外交部长纳拉提公开表示，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经是一个真正有权力并且足以控制整个中国大陆的政府，这已经成为一个谁都不能否认的事实了，中国进入联合国的资格已不成问题，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他说，泰国虽然已经承认台湾政府，但这并不表明泰国的对外政策将永恒不变，相反，泰国对外政策必须根据国际情势的变化而变化。²

事实上，泰国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也源于泰国外交政策“随风倒”的历史传统。第一世界大战初期，拉玛六世宣布泰国保持中立，后来眼见协约国取得战争优势，遂于 1917 年对德宣战，获得了战胜国地位。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披汶眼见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战争取得节节胜利，遂放弃早先宣布的中立立场，转而与日本结盟，公开向英美宣战。历史已经证明，泰国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始终一成不变的。

披汶的反华立场并不是根深蒂固的。1949 年 1 月 21 日，英国政府就中国内战问题向泰国政府递交了一份秘密信函。英国政府称，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很有可能刺激各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一旦中国共产党控

¹（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 0201.7.2.1/50 号

²新华社电讯稿 1956 年 6 月 8 日

制了全中国，其与泰国国内共产主义势力的联络就易如反掌，届时共产主义思想必将以各种形式在泰国传播。为此，英国希望泰国能“就共产主义威胁东南亚国家安全一事表达自己的看法”，并愿意与泰国共商防范措施。¹ 但是，披汶政府不仅未对英国的建议做出正面回应，而且披汶还公开表示，与即将诞生的共产党中国建交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同年 3 月，披汶又宣称，“通过管制报刊和实行新闻检查制度，驱逐那些设立非法组织的中国人，就足以防止共产党或外国人对泰国的渗透。”² 上述讲话表明，披汶最初并未将中国共产党政府打上“敌对政府”烙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披汶政府既未立即承认新中国政府，也未立即表态反对，而是抱着“等等看”的中立态度静观事态的发展。这一点可以从泰国外交部长的讲话中得到证实。1949 年 12 月 1 日，外交部长朴·沙拉信在议会答复议员皮泰·初迪努奇的质询时说，“政府还在研讨是否承认中国新政府。意识形态或政治目标的不同，并不是我们所考虑的问题，苏联是共产主义国家，但我国仍与其保持友好关系就是一个明证。一个国家以何种形式治国，是他们内部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他同时指出，泰国政府之所以尚未表态，是因为中国内战尚未完全平静下来，“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我们就不能随便承认别的政府”。³ 披汶的左右手、警察总监炮上将也提醒政府，在严密防范共产主义渗透的同时，要避免将共产党中国树为敌人，他认为，承认中国

¹ (泰) 泰国总理府文件，第 0201. 77/25 号。

² 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pp89-90.

³ (泰) 泰国下议院会议记录，1949 年 12 月 1 日第 8 次特别会议。

共产党政府也并不意味着泰国就将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¹显然，社会制度异同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并未成为影响泰国统治阶级决定政治立场的主导因素。

披汶政府后来之所以改变“观望”立场并完全倒向美国，成为美国在东南亚的反共桥头堡，这当中既有美国经济和军事援助的因素，也与新中国的侨务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适应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披汶拉拢民主势力

1955 至 1957 年，披汶有意缓和泰中紧张关系，其目的是为了收买民意，以民主势力抗衡军警集团，根本出发点还是为了维护个人的政治利益。

1、国内权力斗争激烈，披汶改变政治思维。

披汶 1948 年上台时，国内政治环境比 1938 年更加复杂。首先，社会上存在着多股反政府势力，既有思想左派的“自由泰”组织，又有不喜欢披汶个人的陆海军军官。1948、1949 和 1951 年，反政府势力三次发动军事政变，企图推翻披汶政府，最后虽以失败而告终，但始终是困扰披汶执政的一个破坏因素。其次，屏·春哈旺集团在政坛上异军突起，独霸军权，直接威胁披汶政权的稳定。领导 1947 年 11 月军事政变的屏·春哈旺中将在政变后亲自出任陆军司令，并将守卫曼谷的陆军第一师交给爱将沙立·塔纳叻指

¹（泰）首牧·英彩亚卡蒙，《披汶政府对华政策》，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1991 年，第 21 页。

挥，同时把女婿炮·西亚暖扶上警察总监助理的位置，从而牢牢掌握了泰国的军警大权。在政治动荡不安的泰国，谁掌握了军权，谁就拥有了政治主动权。因此，政坛上由此形成了两个权力集团，一个由披汶领导，另一个则以屏·春哈旺为中心。

久经政治磨练的披汶清楚地认识到，军队是维护政权稳定的支柱力量，军权一日不在手，他的政府就一日没有安宁。根据对形势的判断，披汶在明知自己无法以强硬手段从屏·春哈旺手中夺取军权的情况下，决定采取“利益诱惑”和“权力制衡”双管齐下的策略消除军人集团的威胁。

所谓利益诱惑，就以提升军衔和职务的方法收买人心，主要对象就是军中少壮派将领沙立，以实现间接控制军队的目的。在披汶有意识的栽培下，沙立的军衔从 1948 年的上校迅速升到 1952 年的上将，其职务也由 1947 年的陆军第一师师长升至第一军军长、陆军司令助理、陆军副司令，最终于 1954 年出任陆军司令一职。¹

所谓的“权力制衡”策略，就是在扶持沙立的同时，披汶又以镇压、防范共产主义威胁为理由，积极壮大炮·西亚暖领导的警察队伍，希望以此制衡沙立，防止军队独自坐大。因此，在沙立官职迅速窜升的同时，炮也像坐火箭似的从警察上校升至警衔上将，最后官拜警察总监。同一时期，美国人也看上了炮·西亚暖，认为他的领导能力强于沙立·塔纳拉，政治前途看好，而且是一位立场坚定的反共产主义斗士，其最大贡献就是推动泰国政府

¹（泰）泰国内阁，《沙立·塔纳拉元帅文选 1959-1961 年》，泰国总理府印刷中心，1964 年，第 3-4 页。

在 1952 年 11 月出台《反共条例》。¹ 因此，美国中央情报局决定重点扶持炮及其领导的警察力量，主要是通过一家名为“东南亚海外供应公司”（Overseas Southeast Asia Supply Company）的美国公司向泰国警察提供大批新式武器装备，同时派遣专家训练泰国警察。美国人的观点与披汶的想法不谋而合，促成了炮的实力迅速壮大，警察总局先后增设了警察突击队、边防警察、警用航空队、水警队、骑警队、坦克与装甲警队等多警种队伍，拥有美国提供的飞机、坦克和巡逻艇等武器装备，战斗威慑力丝毫不比陆军逊色。1955 年，炮手下的警员达到了 48,000 名，其中在曼谷就有 10,000 名警察，而且个个装备精良。² 炮因此而口出狂言“在太阳底下，泰国警察无所不能！”³

1954 年，沙立如愿以偿地从屏·春哈旺手中接过陆军司令一职；几乎在同一时期，炮也在警察系统飞黄腾达，坐上了警察总监的位置，两人都到达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峰。俗话说“一山难容二虎”，权力膨胀后的沙立和炮谁都不服谁，由此开始了一场明争暗斗的政治角逐。炮的亲信普·布纳松坡在回忆录中说：“沙立将军与我家老板的关系本来就有点不顺畅了，而披汶元帅还在两边煽风点火，时间长了，沙立将军就和我家老板反目为仇了。”⁴ 沙立和炮都利用宣传机器展开唇枪舌战，由沙立支持的《自由通讯》报与炮

¹（泰）泰国《政府公报》，1952 年 11 月 13 日。

²（泰）詹塔拉·布拉那叻，毕亚纳·本那，《1920-1963 泰美关系的政治后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1978 年，第 141，144，148 页。

³（泰）蓬·普帕，《扭转乾坤的元帅》，泰国湃琳出版社，1995 年，第 34 页。

⁴（泰）普·布拉纳松浦，《亚洲铁人的 13 年》，曼谷巴拉潘山出版社，1983 年，第 182 页。

操纵的《泰民族》报隔三差五就要向对方发动攻击，互揭老底。《泰民族》报喜欢以妻妾成群、贪污腐败等问题抨击沙立，而《自由通讯》则对炮残酷镇压反对派人士、肆无忌惮贩卖毒品以及伪造货币等种种黑暗面进行曝光。结果，《自由通讯》报的报道更贴近老百姓，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在这场口水战中占了上风。¹ 最能证明沙立和炮关系之紧张的材料应该是下面这段记录：1957 年 9 月 16 日，沙立发动军事政变，推翻披汶政府，炮在政变当天向军方自首时质问沙立“你想把我怎么样？”，沙立回答说“我没有想过要杀你，只有你一直想要我的命”。随后，沙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变的目的只有两个，一个要求披汶内阁总辞职，一个就是要求炮辞去警察总监的职务。²

权力的扩张引发了政治野心的膨胀，沙立和炮都对总理职务虎视眈眈，而披汶也很快就察觉到来自沙立和炮的潜在威胁。1954 年，陆军司令屏·春哈旺表示出退位的意愿，披汶遂要求兼任陆军司令一职，称：“如果把军权交给沙立，我们今后会有麻烦”。³ 显然，披汶此时已对沙立有所防范，但因军权旁落，披汶也奈何不了沙立。结果披汶的预言不幸成真，1957 年 9 月陆军司令沙立发动政变，推翻了披汶政府。另一方面，警察总监炮也是蠢蠢欲动，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1955 年 3 月 18 日，新加坡一报纸公开披露，“再过不久，泰国警察总监炮将接任披汶的总理职务”。该消息被

¹ (泰) 春赛·猜亚瓦, 《炮·西耶暖警察上将与政治权力的争夺》,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 1995 年, 第 153 页。

² 同注 14, 第 72-73 页。

³ (泰) 屏·春哈旺, 《生平与历史事件》, 阿努甘出版社, 1973 年, 第 99 页。

沙立的《自由通讯》转载，引起社会哗然。¹ 同沙立与披汶关系相比，炮与披汶的关系显得更加密切：他可以不受时间限制随意进出披汶的官邸，而且可以直接进入卧室面谈；当披汶出国访问时，由炮负责每天向披汶通报国内政情；² 1955 年《政党法》出台后，披汶成立了一个名为“玛兰卡西拉自由党”，自任该党主席，让炮出任党的秘书长，其在党内的职权甚至超过披汶。³ 即便如此，在炮的政治野心被媒体曝光后，披汶还是对炮采取了防范措施。他乘炮出国访问之际，一口气剥夺了炮的两项重要职权：一是取消立法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本来是披汶为控制国会议员而设立的机构，负责人就是炮；二是调整内阁，解除了炮兼任的财政部副部长职务。此外，披汶还企图以政策法规来限制沙立和炮的职权。1954 年 8 月 25 日和 26 日，披汶先后推出了两份部门法规，即内政部的《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警察力量的规定》和国防部的《关于使用、调动和动员军队的规定》。⁴ 上述法规分别规定，任何使用、调动、动员警察或军队的行为，都必须事先得到内政部部长或国防部部长的同意。而法规出台之时，内政与国防部都直接掌握在披汶手上。因此，该措施出台的真实目的是要限制陆军司令沙立和警察总监炮调动警察与军队的随意性，防范可能发生的武装政变。对于这一点，披汶本人后

¹ (泰) 泰国《自由通讯报》，1955 年 6 月 10 日。

² (泰) 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 0201.2.1.56 / 15 号，第 0201.2.1./604 号。

³ (泰) 马努·玛卡西拉，《1947-1957 披汶巩固政权之策略》，诗那卡琳大学硕士论文，1976 年，第 68 页。

⁴ (泰) 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 0201.2.1.23/41 号，第 0201.2.1.8/76 号

来坦言承认。¹

迷恋权力的披汶仍抱有 1957 年后继续掌权的愿望，但面对沙立和炮一左一右两个政治对手，其连任前景并不光明。在这种背景下，披汶于 1955 年 4 月 14 日至 6 月 22 日出访欧美诸国，包括同军人出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长谈。这是披汶时隔 30 年后首次出国。访问归来，披汶的政治思维出现了变化。1955 年 7 月 1 日，也就是从欧美考察回来后不到两个星期，披汶主动表示将在适当时候辞去总理的职务，以参加 1957 年大选。² 此后，针对法律规定“元帅”等同于永久性公务员而不得参选的问题，他又公开表示将奏请国王取消他的“元帅”职衔。³ 同年 9 月 29 日，披汶又注册成立了“玛兰卡西自由党”，亲任党主席，正式宣告他将以民主方式参政的决心。⁴

披汶建设“民主政治”的措施还包括：放宽对报纸的管制，让报纸拥有自由报道权；建立每周一次的新闻发布制度，希望报纸能成为政府与人民间加强了解的桥梁；允许持不同政见者在皇家田广场举行大型集会，自由发表意见或政治主张，并命令各府尹为当地群众的政治集会提供活动场地；撤销了两个负责监管公务员政治动向的特别委员会；推出泰国第一部《政党法》，规定“只要获得现有国会议员 10 人以上支持或得到 500 名群众的署名支持，就可以注册一个政党”，并允许正式注册的政党开展政治活动，等

¹ (泰) 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 0201.2.1.56/15 号。

² (泰) 泰国《屏泰报》，1955 年 7 月 3 日。

³ (泰) 泰国《自由通讯报》，1955 年 7 月 15 日。

⁴ (泰) 朝纳瓦·苏拉帕，《泰国政党》，曼谷育南澎社团出版，1973 年，第 177-178 页。

等。¹ 其实，在这一系列民主举措的背后，隐藏着披汶的一个政治企图：开放有限度的民主，争取民意的支持，以民主势力抗衡军警集团。显然，这一切都是受到了欧美民主政体的启发。

上述“新政”措施虽然没有给泰国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人集团把持政权以来的政治紧张气氛。这一时期，大小政党如雨后春笋般的涌出来，截至 1957 年 2 月大选前，共有 22 个政党注册成功。在这些政党中，有 6 个政党领导人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思想倾向，因此被称为左翼政党，它们包括“经济人党”、“社会民主党”、“海德公园运动党”、“社会主义党”、“自由民主党”和“工人党”，前 4 个政党还于 1956 年 7 月 12 公开宣布结成“社会主义联合阵线”。² 上述政党虽然在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对外政策上却有着相同的基本点，即主张和平中立，反对泰美结盟，反对东南亚条约组织，要求政府取消《反共条例》，承认新中国政府。尽管披汶的“玛兰卡西自由党”与上述政党有着完全不同的政治主张，但为 1957 年大选着想，披汶不得不对左翼政党的政治要求做出善意的回应。可以说，国内政治斗争的需要是披汶主动缓和泰中紧张关系的主要动因。

2、经济需求推动披汶政策转向

波·披汶颂堪外交政策倒向美国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看上了美国的经济援助。但是，美国所谓的“援助”附带有各种各样的条件，包括：泰国

¹（泰）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 0201.2.1.56/15 号。

²（泰）泰国《沙炎尼功报》，1956 年 7 月 13 日。

必须扩大军队规模和增加军费；禁止泰国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贸易；泰国企业不得与美国企业进行竞争，等等。结果，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政策给泰国经济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害。

泰国是农业国家，大米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是国家重要的财政来源。但是，从 1951 年起，泰国大米出口逐年下降，一是受禁止同社会主义国家贸易的政策影响，二是美国倾销剩余农产品，夺走了泰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致使泰国大米出口锐减。1951 年出口 156 万吨，1954 年跌至 100 万吨左右，而当年可供出口的大米有 200 多万吨。美国的利己行为导致泰国米业处境艰难，碾米厂大部分陷于半停工状态。另一方面，泰国另一重要出口物资橡胶遭到美国的垄断性压价，价格偏低，致使泰国的橡胶收入从 1951 年的 9770 万美元降至 1954 年的 4390 万美元，减少了一半多。¹

表 1：1951 年-1954 年泰国大米出口统计表

年 份	大米出口量（吨）
1951	1,569,800
1952	1,419,500
1953	1,353,100
1954	1,022,500

注：数据来源于泰国国家档案馆，外交部文件，第 70/49 号

一方面是出口锐减，另一方面却大量进口备战物资，导致泰国的贸易状况日渐恶化。从表 2 可以看出，1947 至 1949 年，即朝鲜战争爆发前，泰国主要商品大米、橡胶、锡的出口不受限制，每年贸易逆差额并不大；1950

¹新华社电讯稿，1956 年 7 月 25 日。

至 1952 年，即朝鲜战争期间，大米、橡胶等战略物资大量出口美国，为泰国创造大量外汇收入；但 1953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对橡胶、锡等战略物资需求量减少，同时出口市场又受到贸易禁令的限制，导致泰国当年出现贸易逆差 7 亿多铢，1954 年更上升到 11 亿多铢。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批工商业企业倒闭，成千上万人失业，百姓怨声载道。

表 2：1951 年-1954 年泰国贸易平衡状况

年 份	贸易顺差（百万铢）	贸易逆差（百万铢）
1947	-	139.3
1948	-	57.3
1949	-	152.8
1950	695.1	-
1951	759.4	-
1952	136.1	-
1953	-	719.7
1954	-	1,108.4

注：数据来源于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第 0201.2.1.26/20 号

泰国各界人士越来越多地认识到继续跟随美国扩军备战只会给泰国带来更多的灾难，纷纷呼吁政府改变“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摆脱美国的束缚，发展与中国等国家的正常贸易关系。议员彭泰·触的努七指出，泰国当局片

面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已使泰国经济情况陷于困难境地，泰国经济唯一急需做事情就是扩展对中国的直接贸易；泰国副总理哇拉干·班差也认为“继续实行禁运政策，在某些方面将使泰国的经济遭到损失。”泰国自由民主党议员阿里·丹的域差军称，同中国直接贸易，其实不该成为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只是由于泰国处在美国的控制之下而已。¹

泰国的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主张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暹罗群众》报评论说，禁运政策只对美国有好处，而东南亚国家却因对中国“禁运”而丧失了良好的出口市场。《经济》半月刊还发表了题为“同中国贸易是泰国的出路”的社论，指出解决泰国经济危机的途径是在互利基础上开展和东方国家，特别是和中国的贸易；泰国片面同西方国家市场挂钩的结果已清楚地表明，泰国商品在市场和价格上一直受到不公平待遇。社论说，泰国人民要求开展对华贸易，政府不应忽视人民的要求。《泰人》报也发表社论指出，禁止同拥有六亿人口的国家进行贸易，其实是一种自我禁锢。更严重的问题是，当泰国不卖商品给中国的时候，别人却在自由自在地同中国进行贸易。²

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迫使披汶不得不重新考虑对华政策。1954 年 3 月，披汶指令泰国外交部尽力搜集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贸易协议，以供内阁参考。内阁会议要求外交部起草同社会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关系的框架文件，但是遭到外交部的反对，认为此举违反了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³调整对华政策一事由此被暂时搁置。1956 年 5 月，披汶总理再次要求外交部

¹新华社电讯稿，1956 年 1 月 10 日。

²新华社电讯稿，1956 年 6 月 26 日。

³（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 0201.45/23 号。

检讨对华贸易禁令，要求提供详细的利益得失报告。结果，外交部这一次推翻了 1954 年的意见，认为泰美经济和军事援助协议只禁止泰国战略物资，即橡胶和锡的出口，而大米和其他商品不在上述协议的限制范围之内。¹ 泰国外交部长纳拉底在 5 月 31 日就中泰关系向媒体发表谈话说，由财政部、经济部和外交部联合起草的泰中直接贸易计划书将于近日提交内阁研究，计划书中特别说明泰国商人同中国建立直接贸易关系并不算犯法。此后，泰国对华贸易政策出现松动。6 月 13 日，泰国政府决定允许自由输出大米和木材给所有国家，包括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6 月 15 日，泰国总理披汶说，同共产党国家建立贸易关系已经是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泰国重新调整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是必要的；同一天，泰国财政部长兼代理经济部长帕姆里攀·裕他吉承认，泰国同中国进行直接贸易有助于泰国政府推行压低物价的政策，他鼓励泰国商人大胆同中国进行贸易；6 月 21 日，泰国政府正式发表声明，决定从即日起开始解除关于非战略物资贸易的禁令，泰国可以同世界上任何国家进行自由贸易。²

三、中国政府为改善双边关系做出积极努力

泰中紧张关系能够在 1955 年至 1957 年间出现短暂的缓和，除了同泰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关外，还同中国政府做出的种种外交努力有着密切的联系。

¹（泰）泰国总理府文件，第 0201.45/42 号。

²新华社电讯稿，1956 年 6 月 28 日。

1、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

华人的身份问题一直是困扰泰中关系正常化的一个因素。中国自 1909 年颁布第一部国籍法以来，历届政府都延续了以“血统主义确定国籍”的原则，规定只要父母一方为中国籍，不管在中国境内或境外所生子女均具有中国国籍。而泰国自 1913 年第一部《国籍法》以来，就一直坚持“出生地主义原则”，规定凡在泰国境内出生的人，不论其父母属何国籍，均为泰国公民。这样，很多在泰的华人自然拥有了双重国籍。据统计，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泰国的 350 万华人中，具有“双重国籍”者约为 230 万。¹ 受冷战思维的影响，泰国统治集团一直担心在泰华人政治上倾向中国，成为“红色中国”向当地输出革命的海外载体，同时又担心中国政府会以保护华侨权益为借口而干涉本国内政。1955 年 4 月，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时就指责中国利用具有双重国籍的华侨在泰国推行颠覆政策。因此，华人双重国籍问题成为中泰关系能否缓和并走向和解的障碍。

面对“华人效忠谁”的国籍冲突问题，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的态度，积极采取措施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1954 年 9 月 23 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华人的国籍问题是中国过去的反动政府始终不加解决的问题，这就使华人处于困难的境地。并且在过去常常引起中国同有关国家之间的不和。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们准备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首先同

¹吴前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39 页。

已经建交的东南亚国家解决这个问题。”¹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指出：“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地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²

在东南亚诸国中，印尼率先冲破资本主义阵营的阻挠，于 1950 年 4 月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故此，中国毫无疑义地选择了印尼来率先解决双重国籍这个棘手问题。1955 年 4 月 22 日，中国与印尼外长在万隆签署《中国和印尼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同年 6 月，两国就条约的目的和实施办法达成了谅解，并进行了换文。1960 年 12 月双方制定并公布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的实施办法》。条约、换文和实施办法详尽地反映了中国政府对待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政策，基本主张包括：一个华人不应该有双重国籍，要取得所在国国籍，就必须放弃中国国籍；如果愿意保留中国国籍，就不再是所在国公民。中国政府希望华人自愿选择所在国国籍，取得所在国公民资格，完全效忠于所在国。他们同中国的关系，只是亲戚关系。如果他们选择中国国籍，作为华人就应当尊重所在国法律，不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有华人的国家不应歧视华人，华人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当地政府的尊重和保护。针对泰国政府对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担忧，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向泰国外长提出建议，希望以印尼为模式，根据自由选择国籍的原则解决泰国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以消除华人“政治归属问题”。³

¹ 《人民日报》社论，1955 年 4 月 23 日。

² 陈文寿，《毛泽东的华侨观：侨务·统战·外交》，见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847>。

³ 张锡镇，《中泰关系四十年》，载《东南亚研究》1990 年第 2 期，第 3 页。

2、中国政府积极调整侨务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海外众多华人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认同中国，而且在行动上配合中国政府的各种号召，激起了当地政府的恐慌，东南亚各国普遍盛行“华人是‘第五纵队’”的谬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间关系正常化。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旗帜鲜明地确立华侨不介入和参与侨居国政治的原则，尤其是严格区分华侨工作与侨居地革命，即“各国非法活动或是革命，但那是本国自己的事，华侨不应该参加。”¹

1954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会见缅甸总理吴努时说：“在缅甸的华人中也有激烈分子，我们劝他们不要干涉缅甸内政。我们教育他们服从侨居国的法律，不要跟以武装反对缅甸政府的政党取得联系。我们在华人中不组织共产党，已有的支部已经解散。我们在印尼和新加坡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嘱咐缅甸的华人不要参加缅甸国内的政治活动。只可以参加缅甸政府准许的一些活动，如庆祝活动等等，别的就不要参加。”同时表示：“我们在泰国有三百万华侨，我们的方针也是一样。”²

1955 年 12 月，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泰国代表团时，首先批驳了当时正在泰国流传的“中国准备利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作为侵略泰国的基地”的谣言，并主动邀请泰国客人在回国前顺便访问云南，以便亲眼证实，中国是否如传言所说的那样正在做入侵泰国的准备。³他同时明确表示：“我们国外华

¹陈文寿，《毛泽东的华侨观：侨务·统战·外交》，见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847>。

²陈文寿，《毛泽东的侨务观（下）》，<http://qwgzyj.gqb.gov.cn/qwhg/136/900.shtml>。

³朱振明，谢远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刊《东南亚》1990 年第 1 期，第 8 页。

侨的共产党组织也取消了，以消除华侨所在国政府的怀疑，使大家互相信任。”他同时重申：“口说无凭，你们以后还可以看事实。看的时间久了，就看清了。”¹

毛泽东所说的事实之一就是中共停止在海外华人社会的组织发展工作。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共中央设有以朱德为主任的海外工作委员会。在该委员会的领导下，曾积极推进海外、尤其是东南亚一带的侨运工作，发展了不少华党员。1952年1月，由毛泽东签发的《中共中央关于海外侨民工作的指示》，在继续强调保护华侨和统一战线的同时，要求“海外侨民一切活动应严格的遵守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和我国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中国侨民不应参加以直接推翻当地政府为目的的活动”；强调“侨民中的工作和侨民团体的工作，应当是公开的合法的，不做秘密工作，不组织秘密团体”；申明中共不在海外华侨中建立组织，原有的组织“应经过一定步骤做到最后宣布取消”；同时劝告国内各民主党派“不要建立海外支部”。²

3、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促进泰中关系和解。

1953年朝鲜停战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渐放弃东西方两大阵营的“二元”式战略思维，提出了非意识形态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于中国政府来说，朝鲜战争后的当务之急是国内经济建设，对外关系的首要目标是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积蓄力量，最终完成对台湾的统一。基于这种方

¹陈文寿，《毛泽东的华侨观：侨务·统战·外交》，见<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847>。

²陈文寿，《毛泽东的侨务观（下）》，<http://qwgzyj.gqb.gov.cn/qwhg/136/900.shtml>。

针，中国一方面继续加强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以“和平共处”原则为指导，积极主动地发展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同时探索与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交往，以促进政治承认。

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国总理周恩来作了著名的“求同存异”的精辟发言，强调“根据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的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他同时指出：“根据这五项原则，中国同泰国、菲律宾等邻国的关系没有理由不能获得改善。”再次重申了中国愿在和平友好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泰国发展友好关系的愿望。会议闭幕前，周恩来总理与泰国代表团团长、泰国外交部长旺·威泰耶康亲王进行了会晤，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泰两国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周总理向旺亲王建议可以根据中国和印度尼西亚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原则，解决泰国华人的国籍问题，并邀请旺亲王到中国访问。

1955 年底，周恩来总理在接见泰国秘密使团时指出，泰国实行君主制并不妨碍中泰之间的友谊，“各国人民都必须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体制，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国家制度的不同而去批判他们或拒绝与他们交朋友”。周总理还形象地比喻说，建立友谊像喝茅台酒一样，要慢慢来，酒喝快了容易醉，匆忙建立的友谊也不能持久。”¹

1955 年 12 月 16 日至 17 日，中泰两国政府代表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举行了秘密会谈。中国在送交泰国的会谈备忘录中指出：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中泰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中国绝不会侵略别国，不会以泰国为敌，也希望泰国不要以中国为敌，希望中泰双方

¹朱振明，谢远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刊《东南亚》1990 年第 1 期，第 9 页。

和平共处；中国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按照中国宪法规定而建立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为了使泰方了解真实情况，中国政府欢迎泰国代表团前往西双版纳访问；关于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如果泰国政府同意，中国政府愿意以解决印度尼西亚华人的双重国籍的方式，解决泰国华人的双重国籍问题；中国政府愿意同泰国政府建交，如果泰国政府认为条件不成熟，中国愿意等待。中国政府声明，如果泰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割断和台湾当局的一切官方联系；中国愿意同泰国进行贸易交往，如果目前泰国还不能同中国直接贸易，可以通过香港进行。¹

中国政府的上述努力，充分展示了中国睦邻友好的诚意，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泰国当权者的疑惧，对波·披汶颂堪政府下决心迈出泰中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中泰关系虽然出现缓和的趋势，但却是昙花一现。由于泰国国内政治局势的突变，中泰关系重又进入了黑暗时期。沙立的军人政变导致了新的极端亲美的政府，中国自然又成了泰国的敌人。

¹朱振明，谢远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刊《东南亚》1990年第1期，第9页。

เอกสารอ้างอิง

阿利·披荣 1999《新时期泰中建交之内幕》，林明点译，香港嘉富林国际有限公司。

常媛 1996《龙之珠》，上海远东出版社。

陈文寿，《毛泽东的华侨观：侨务·统战·外交》，见

<http://www.tecn.cn/data/detail.php?id=11847>。

陈文寿，《毛泽东的侨务观（下）》，

<http://qwgzyj.gqb.gov.cn/qwhg/136/900.shtml>。

《人民日报》社论，1955年4月23日。

朱晓东 2004《5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与越南抗美救国战争》，郑州大学硕士论文。

新华社电讯稿。

吴前进 2000《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睦邻友好关系开辟的前提—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张锡镇 1990《中泰关系四十年》，载《东南亚研究》年第2期。

朱振明，谢远章 1990《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中泰建交》，载《东南亚》第1期。

（泰）朝纳瓦·苏拉帕 1973《泰国政党》，曼谷育南澎社团出版。

（泰）春赛·猜亚瓦 1995《炮·西耶暖警察上将与政治权力的争夺》，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

（泰）蓬·普帕 1995《扭转乾坤的元帅》，泰国湃琳出版社。

（泰）马努·玛卡西拉 1976《1947-1957 披汶巩固政权之策略》，诗那卡琳大学硕士论文。

（泰）屏·春哈旺 1973《生平与历史事件》，阿努甘出版社。

(泰) 泰国《屏泰报》。

(泰) 普·布拉纳松浦 1983《亚洲铁人的 13 年》，曼谷巴拉潘山出版社。

(泰) 首牧·英彩亚卡蒙 1991《披汶政府对华政策》，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

(泰) 泰国国家档案馆，内政部文件。

(泰) 泰国内阁 1964《沙立·塔纳拉元帅文选 1959-1961 年》，泰国总理府印刷中心。

(泰) 泰国《沙炎尼功报》。

(泰) 泰国下议院会议记录，1949 年 12 月 1 日第 8 次特别会议。

(泰) 泰国《政府公报》。

(泰) 泰国《自由通讯报》。

(泰) 泰国《自由通讯报》。

(泰) 泰国总理府文件。

(泰) 詹塔拉·布拉那叻，毕亚纳·本那 1978《1920-1963 泰美关系的政治后果》，泰国朱拉隆功大学硕士论文。

Daniel Fineman, **A Special Rel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Military Government in Thailand, 1947-1958**,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pp89-90.

แปลสรุปบทความโดยสังเขป

สาเหตุ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จาก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สู่การผ่อนคลาย ในยุค 1950

หลังสิ้นสุดสงครามโลกครั้งที่สอง โลกถูกแบ่งออกเป็นสองค่ายอย่างชัดเจน กล่าวคือ 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เป็นผู้นำค่ายเสรีนิยม สหภาพโซเวียตเป็นผู้นำค่ายสังคมนิยม 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พยายามล้อมกรอบและหยุดยั้งการขยายตัวของคอมมิวนิสต์ และชักชวนประเทศต่างๆ มาเข้าร่วมเพื่อต่อต้านลัทธิคอมมิวนิสต์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ถือเป็นหนึ่งในจุดยุทธศาสตร์สำคัญที่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สามารถปล่อยให้หลุดมือไปได้ เนื่องจากมีตำแหน่งที่ตั้งอยู่ใกล้กับเขตอิทธิพลของสหภาพโซเวียตและจีน ดังนั้นนับตั้งแต่ปี 1949 ถึง 1954 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ได้ให้ไทยเข้าเป็นแนวร่วมสำคัญในการต่อต้านลัทธิคอมมิวนิสต์ในอุษาคเนย์

ในปี 1955 ถึง 1957 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เข้าสู่ภาวะที่ผ่อนคลายลง หลังจากที่รัฐมนต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ได้มีโอกาสพบปะกันเป็นครั้งแรก ณ 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ที่เมืองบันดุงในเดือนเมษายนของปี 1955 และมีการพบปะกันอย่างลับๆ ในเวลาต่อมา จนกระทั่งในเดือนมิถุนายน ปี 1956 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ได้ผ่อนปรนการติดต่การค้าขายและการไปมาหาสู่ระหว่างประชาชน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จนถึงเดือนตุลาคม ปี 1958 รัฐบาลจอม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ได้ส่งผู้แทน 24 คนไปพบ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และผู้นำ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ทั้งมีการส่งบุตรสองคนของคุณสังข์ พิธินทัยให้รัฐบาลจีนช่วยดูแล เพื่อเป็นการแสด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มิตรและจริงจังต่อการฟื้นฟู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ดี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ให้เกิดขึ้นอีกครั้ง นี่ถือเป็นจุดเริ่มต้น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แน่นแฟ้น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จีน และควรค่าต่อการสานต่อให้ดำรงสืบไป

การ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จีนในช่วงต้นยุค 1950 นั้น นอกจากเป็นการแปรเปลี่ยนไปตามกระแสโลกแล้ว ยังเกิดจากเหตุปัจจัย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เอง

1. 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โลกเข้าสู่ช่วง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กับนโยบาย “อ้อลู่ลม” ของรัฐบาล จอมพล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หลังมีข้อตกลงยุติสงครามเกาหลี ภาวะสงครามหลังยุคสงครามเย็นก็เริ่มสงบลง จากสงครามครั้งนี้ทำให้เห็นว่า รัฐบาลจีนใหม่ซึ่งเริ่มก่อตั้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ด้ไม่นานสามารถต่อกร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มหาอำนาจอย่า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ได้และแสดงให้เห็นถึงอิทธิพล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จีนใน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เข้าร่วมประชุมนานาชาติที่เมืองเจนีวาระหว่างครั้งแรกในฐานะ “มหาอำนาจ” ใ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พยายามแสดงออกถึงเจตนารมณ์และความจริงจังที่จะสร้างสันติสุขให้เกิดขึ้นในภูมิภาค รวมถึง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มพันธ์อันดีกับ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 ในเดือนพฤษภาคม ปี 1955 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ได้ขึ้นกล่าวในที่ประชุม ณ เมืองบันดุงว่า “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และประชาชนสหรัฐมีมิตรภาพที่ดีต่อกัน 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ไม่ยากหากสงครามกับสหรัฐ รัฐบาลจีนยินยอมที่จะเจรจากับรัฐบาลสหรัฐถึงการสร้างสันติให้เกิดขึ้นในตะวันออกไกล โดยเฉพาะปัญหา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ในไต้หวัน” คำกล่าวนี้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มากมาย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ตะวันตก และได้มีการเจรจา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ระหว่า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กับจีนขึ้นที่เมืองเจนีวา ในวันที่ 1 สิงหาคม 1955

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เริ่มเห็นสัญญาณ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ที่เกิดขึ้นของ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โลก รัฐสภามีความเห็นชอบว่าไทยมีความจำเป็นที่จะต้องปรับเปลี่ยนท่าทีนโยบาย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ให้เป็นไปตามบริบทการเมืองโลกในปัจจุบัน รวมไปถึงนโยบาย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ที่มีต่อรัฐบาลของ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จุดยืนในการต่อต้านจีนของ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นั้นสามารถ

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ได้ตาม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ละมีความเป็นไปได้ที่จะสร้างสัมพันธ์ไมตรีกับจีนคอมมิวนิสต์ แต่เดิมนั้น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ก็มีได้มองจีนว่าเป็นศัตรู และได้มีท่าทีที่ยอมรับหรือต่อต้านอย่างขัดแย้งหลังจากที่มีการสถาปนา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ขึ้นแต่อย่างใด เพียงแต่มองดู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อย่างเป็นกลางว่าจะมีทิศทางเป็นเช่นไร

2. การปรับตัวกับความขัดแย้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ภายใน: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ดึงอำนาจทาง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

ปี 1955 ถึง 1957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ที่จะ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ขอ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 โดยมี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พื่อได้รับคะแนนเสียงจากประชาชน ใช้อำนาจ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มาต่อสู้กับกลุ่มทหารตำรวจ เพื่อรักษาอำนาจ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ตนไว้

1) อำนาจ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มีความขัดแย้งอย่างรุนแรง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เปลี่ยนแนวความคิด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ในปี 1948 ที่จอมพล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ขึ้น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ก็มีความซับซ้อนอยู่ไม่น้อย ซึ่งมีหลายกลุ่มที่ออกมาต่อต้านอำนาจของรัฐบาล มี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ล้มล้างรัฐบาลของ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อยู่หลายครั้ง ถึงแม้ว่าจะไม่ประสบความสำเร็จ แต่ได้นำมาซึ่งการสั่นคลอนเสถียรภาพของรัฐบาลในขณะนั้น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มี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ที่จะรักษาอำนาจของตนต่อไปจนถึงปี 1957 แต่ก็ต้องเผชิญกับคู่แข่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เช่น จอมพลสฤษดิ์และจอมพลเผ่า หลังกลับมาจาก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เยือนสหรัฐและยุโรปของ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ในปี 1955 ก็ทำให้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มีความคิด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เปลี่ยนไป มีความปรารถนาที่จะลาออกจากตำแหน่งเพื่อลงสมัครเลือกตั้งในปี 1957 จากนั้นจึงมีการตั้งข้อกำหนดที่ว่าห้ามผู้ที่มียศ “จอมพล” เข้ารับ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 และขอพระราชโองการจากในหลวงให้ถอดถอนตำแหน่งของตนออก จากนั้น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ก็ได้มีการตั้ง “พรรคเสรีมนังคศิลา” และขึ้น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หัวหน้าพรรค แล้วประกาศความมุ่งมั่นของตนที่จะดำรงตำแหน่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โดยวิถีของ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

จากนั้น ก็ได้มีการปรากฏขึ้นของ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ใหม่ ถึงแม้ว่าจะยังไม่ใช่ประชาธิปไตยที่สมบูรณ์ แต่ก็สามารถลดทอนอำนาจ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ของเหล่าทหารลงได้ 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ใหม่ที่เกิดขึ้นถึงแม้จะมีนโยบาย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น หากแต่นโยบายด้า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ล้วนมีจุดยืนที่คล้ายกัน คือการดำรงไว้ซึ่งความเป็นกลางและสันติต่อต้านการเป็นสัมพันธมิตรกับสหรัฐต่อต้านองค์การสนธิสัญญาป้องกันภูมิภาค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 ต้องการให้รัฐบาลยกเลิก “ข้อบังคับต่อต้านคอมมิวนิสต์” และให้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รัฐบาลจีนใหม่ ถึงแม้ว่า “พรรคเสรีมนังคศิลา” ของ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จะมีแนวทาง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ไม่เหมือนกับพรรคอื่นๆ แต่เพื่อเป้าหมายการเลือกตั้งในปี 1957 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โอนอ่อนผ่อนตาม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ของพรรคการเมืองฝ่ายซ้าย จะเห็นได้ว่า ด้วยสาเหตุจากการแข่งขัน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ถือเป็นปัจจัยสำคัญที่ทำให้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ต้องผ่อนคลายความตึงเครียดระหว่า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

2) ความต้องการ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นโยบายของจอมพล ป. 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เหตุผลสำคัญประการหนึ่งที่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มีนโยบายโอนเอียงไปทา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 คือ การ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 แต่ความช่วยเหลือดังกล่าวที่ได้รับมานั้นมาพร้อมกับเงื่อนไขต่างๆ มากมาย เช่น ไทยจะต้องเพิ่มแสนยานุภาพและงบประมาณการทางทหาร ห้ามไทยทำการค้า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ที่เป็นสังคมนิยม ห้ามธุรกิจของไทยแข่งขันกับธุรกิจของอเมริกา เป็นต้น สุดท้ายแล้ว นโยบายที่เดินตามหลังสหรัฐของไทยได้นำความเสียหายทาง

เศรษฐกิจมาสู่ประเทศ

ประชาชนไทยเริ่มตระหนักได้ว่าการขยายกำลังทางทหารตามคำแนะนำของอเมริกา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ต้องตกต่ำลง จึงมีการเรียกร้องให้รัฐบาลเปลี่ยนแปลงท่าที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ที่อยู่ภายใต้การนำของ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เพียงฝ่ายเดียว หันมาทำการค้า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ๆ ซึ่งจากปัญหา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ที่หนักขึ้นทุกวันทำให้จอมพล ป.พิบูลสงคราม จำเป็นต้องพิจารณานโยบายที่มีต่อจีนเสียใหม่ ในวันที่ 21 มิถุนายน 1954 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ได้ประกาศยกเลิกการกีดกันทาง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ทำการค้า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ใดๆ ก็ได้

3. รัฐบาลจีนพยายา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ดีระหว่า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ความจริงเครียด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จีนเริ่มผ่อนคลายลงในปี 1955 ถึง 1957 ซึ่งนอกจากปัจจัย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และเศรษฐกิจภ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แล้ว ยังเป็นผลมาจากการพยายามเชื่อมสัมพันธ์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การ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จีนเอง

1) การแก้ปัญหาบุคคลสองสัญชาติ

สถานะ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ไทยถือเป็นหนึ่งปัจจัยที่บั่นทอน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มาตลอด ตั้งแต่ปี 1909 จีนยึดหลักการให้สัญชาติ “ตามสายเลือด” กล่าวคือไม่ว่าบุคคลผู้นั้นจะกำเนิดในแผ่นดิน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ขอเพียงแค่บิดาหรือมารดาเป็นผู้ถือสัญชาติจีนก็จะได้รับสัญชาติจีน ส่วนไทยเริ่มดำเนินกฎหมายการให้สัญชาติโดยยึดหลักการ “ตามภูมิลำเนา” ในปี 1913 โดยให้สัญชาติไทยกับบุคคลผู้กำเนิดในแผ่นดินไทย ไม่ว่าบิดามารดาจะถือสัญชาติใดก็ตาม ส่งผลให้ขณะนั้นมี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ไทยหลายคนที่เป็นบุคคลสองสัญชาติ ทำให้อาจมีชาวจีนผู้ถือสองสัญชาติ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ถึง 2.3 ล้านคนจากจำนวนทั้งหมด 3.5 ล้านคน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กังวลใจแก่รัฐบาลไทยว่าชาวจีนเหล่านั้นจะสมคบ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และก่อตั้งขบวนการปฏิวัติขึ้นนอกแผ่นดินจีน

เพื่อแก้ปัญหาความขัดแย้งเรื่องบุคคลสองสัญชาติ รัฐบาลจีนใหม่จึงได้ดำเ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ยกเลิกการรับรองสัญชาติแก่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 หลายประเทศในเอเชียตะวันออกเฉียงใต้อย่างเช่นอินโดนีเซีย ที่มีการสถาปน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ตั้งแต่เดือนเมษายน 1950 และมีการเซ็น “สนธิสัญญาว่าด้วยปัญหาบุคคลสองสัญชาติระหว่างจีนและอินโดนีเซีย” ขึ้นในวันที่ 22 เมษายน 1955 ซึ่งสำหรับ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แนะนำให้ใช้อินโดนีเซียเป็นโมเดลใน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ญหาดังกล่าวต่อไป

2) รัฐบาลจีนพยายามปรับปรุงนโยบายกิจการ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

หลังการสถาปนา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อัตลักษณ์ชาติ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ส่วนใหญ่ไม่ว่าจะเป็นด้านการเมือง เศรษฐกิจ วัฒนธรรมล้วนเป็นหนึ่งเดียวและคล้อยไปตามรัฐบาล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ซึ่ง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หวาดระแวงแก่รัฐบาลในท้องถิ่นนั้นๆ ด้วยสาเหตุนี้ รัฐบาลจีนจึงห้ามมิให้ผู้ถือสัญชาติจีนที่พำนักอาศัยใน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เข้าร่วมกิจกรรมและเคลื่อนไหว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ผิดกฎหมาย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นั้นๆ ถือว่าเป็นเรื่องภายในของท้องถิ่นที่ไม่ควรเข้าร่วม ดังคำกล่าวของเหมาเจ๋อตุงที่ว่าพรรคคอมมิวนิสต์จีนควรหยุดภารกิจในองค์กรทางสังคมของชาวจีนโพ้นทะเลเสีย

3) จีนยืนหยัด “หลัก 5 ประการแห่งการอยู่ร่วมกันอย่างสันติ” 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สมานฉันท์บน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

หลังยุติสงครามเกาหลีในปี 1953 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ก็ค่อยๆ ยุติสงครามระหว่างสองชั่วอำนาจตะวันออกและตะวันตก แล้วหันมา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ทางการทูตไปสู่เป้าหมายเพื่อการอยู่ร่วมกันอย่างสันติ สะสมกำลังเพื่อรอการผนวกได้วันต่อไปในอนาคต ซึ่งทำให้จีนต้องเสริม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นดีกับโซเวียตซึ่งเป็นผู้นำค่ายสังคมนิยม และ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ก็ยึดหลักอยู่ร่วมกัน

อย่างสันติ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นบ้าน รวมไปถึง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ญี่ปุ่นและตะวันตกเพื่อให้ได้รับ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ทางการเมือง

ใน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เอเชีย-แอฟริกาที่เมืองบันดุง ประเทศอินโดนีเซีย 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ของจีนได้ประกาศหลักการ “อยู่ร่วมกันบนความแตกต่าง” โดยเน้น “หลักการเคารพในอธิปไตยและดินแดนที่สมบูรณ์ ไม่รุกราน ไม่แทรกแซ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ภายใน ได้รับผลประโยชน์ที่เท่าเทียมร่วมกัน ประเทศที่ระบอบทางสังคมที่แตกต่างก็สามารถอยู่ร่วมกันอย่างสันติได้” 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ยังกล่าวว่าจาก “หลักการห้าประการ” ข้างต้นจะสามารถสร้าง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ที่ดีใหม่ต่อ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นบ้าน หลัง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โจวเอินไหลและพระองค์เจ้าวรณไวทยากร รัฐมนตรีการต่างประเทศของไทยได้เข้าพบปะหารือกัน ซึ่งเป็นการพบปะ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ครั้งแรกระหว่างผู้นำ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ประเทศ รวมถึงได้เชิญให้พระองค์เจ้าวรณไวทยากรเดินทางเยือนประเทศจีน

วันที่ 16-17 ธันวาคม 1955 ผู้นำของไทยและจีนได้จัดประชุมลับขึ้นที่สถานทูตจีนประจำประเทศพม่า รัฐบาลจีนกล่าวว่า ห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ให้การยอมรับสถานะ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ก็ต้องตัด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อย่างเป็นทางการทุกด้านกันได้วันเสีย และถ้า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ยังไม่สะดวกจะ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ค้ากับ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โดยตรงก็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ผ่านทางฮ่องกงได้ จากความพยายามดังกล่าว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รับความเชื่อใจจากประเทศเพื่อนบ้าน จนนำไปสู่การพัฒนา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ระหว่างกันในเวลาต่อมา

ถึงแม้ความสัมพันธ์ไทยจีนจะเริ่มผ่อนคลายได้ไม่นานก็กลับเข้าสู่ยุคมืดอีกครั้งหนึ่ง หลังจอมพลสฤษดิ์ ธนะรัชต์ก่อการรัฐประหาร ซึ่งดำเนินนโยบายเข้าหาสหรัฐอเมริกาแล้วมองว่าจีนคือศัตรู